

大学之道

高等教育面临四大挑战

■贵州大学党委书记 姚小泉

在十八大会议上,党中央提出了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在贵州大学所在的贵州省,省委省政府也提出要同步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些都给贵州高等教育提出了艰巨的任务。当前,国际、国内的竞争主要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这对于将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将人才视为第一资源的高校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更好地提高高等教育人才质量,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在十八大报告中,对于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问题,党中央已经给出了明确方向,那就是高等院校要打造内涵建设。在我看来,所谓内涵式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要求我们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培养更多合格人才,更好地为全面进入小康社会服务。作为高等院校,我们也应该履行这一历史责任。为此,包括贵州大学在内的国内各高校也在积极行动。

但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高等教育还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特别是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具体到我国中西部的高等教育建设,要真正实现为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培养好人才,在我看来,我们现阶段的高等教育还面临着四大矛盾。

首先,是规模与质量之间的矛盾。自上世纪末,国内高等教育进入扩张时期。然而在规模扩大的同时,如何保证培养质量却成为了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当然,我们绝不能小看如今的“80后”、“90后”大学生,他们有着广阔的知识面,其创新能力和协作精神也并不比当初的大学生差,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在学生培养方面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教育资源使用的不均衡现象。

教育均衡问题不但出现在基础教育中,在高等教育阶段,教育的不均衡同样存在。比如在沿海地区的“985工程”、“211工程”大学,其每年获得的投资和经费乃至校友捐赠,都不是中西部高校所能比肩的。严格来说,中西部高校,尤其是西部高校的办学条件不尽如人意。当然,投入并不是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唯一因素,但这一问题却是切实摆在西部高校面前的,实际上这也是全国普遍存在的。

其次,结构与效益之间的矛盾。在如今的国内高校,专业种类越来越多,专业划分也越来越细,但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的专业,或者很难招来学生的专业并不在少数。如今新一轮的专业结构调整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一些专业划分必须作出调整,否则将是死路一条。

自主招生与异地高考中的利益悖论

■熊丙奇

三大自主招生联考的方案前不久公布,每个联考均只考两门,以及考试时间被安排在同一天,引起不少学生和家长的不满。在上海,一些考生就“吐槽”认为理科只考数学、物理两门,对于选化学和生物的学生不公平,三大联考放在同一天,也让学生很纠结。进而呼吁,出台政策时应该听取学校、老师和学生的意见,不能搞突然袭击。不少家长也有相同的意见。

笔者很赞赏学生和家长的意见,同时也感慨,没有话语权,每个受教育者(及其家长)其实都是弱者。对自主招生联考政策有意见的沪上学生和家长都是有上海户籍的,他们在自主招生政策上呼吁听取意见,做到公平。如果能推此及彼,想到,此时景中的他们和正在争取平等考试权的进城务工人员处境很是相似——进城务工人员也苦于自己的意见得不到表达,努力争取平等权利的少女占海特一家现在就身处困境。

每个人站在自身的利益角度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没有错,但大家要意识到,教育平权是惠及每个人的最终选择。在高考公平问题上,北京人和上海人出于现实利益,不愿意开放异地高考,可他们没有想到,目前这种画地为牢的招生录取方式极有可能让自己的子孙也深受其害。比如,一个上海人到北京去工作、生活,孩子出生在北京,按照现在的政策,其子女在北京也不能参加高考,必须回到上海。

而要推进教育平权,就要建立将民意纳入教育决策的基本机制。在自主招生政策的制订中,应该充分听取民意。同样,在开放异地高考问题上,也应该听取各方意见,对如何开放达成共识。只有建立这样的机制,大家的意见才会得到表达、尊重。不然,在某个议题中貌似强势的群体,在另一个议题中就极有可能是弱势。这不仅对受教育者群体如此,对教育者、办学者、教育管理者群体来说也是如此。相对受教育者来说,教育者群体更强势,可在评价、考核方面,他们同样没有话语权,需要被行政力量支配;相对受教育者来说,办学者处于强势地位,可对于行政部门而言,给办学者的自主空间又极为狭窄……这就是教育系统中各个层次的教育人都不断抱怨,觉得自己很弱势的原因。

其实,只有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将民意纳入决策程序,是不难找到合理、可行的解决方案的。拿异地高考来说,在目前的高考制度框架下,通过开放高考报名条件的方式推进异地高考,必然引发本地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员的利益冲突。形象点说,本地户籍人口会认为这是外来人员抢自己碗里的“蛋

糕”。而如果推进高考改革,打破现在的高考录取框架,实行高校自主招生,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一方面,推进高校自主招生改革,从转变基础教育应试教育格局角度看,对于所有受教育者都有利。如果能建立多元的高考评价、选拔体系,引导基础教育进行个性、多元教育,我国教育将走出单一的应试模式困境,也让受教育者解放了出来;另一方面,国内重点大学实行基于统一测试的自主招生,也会改变各地的高考利益格局。如果北京、上海户籍人口认为上海、北京学生素质高,那么,完全可以在新的自主招生体系中也获得优势,而这种优势将更具说服力——不是靠高考录取指标多而获得更多进入大学的机会,而是在新的平等的多元评价体系中,获得更好的评价而被录取。

再者,在自主招生多元评价体系中,为校正不同地区的教育差异,通常会有地区教

育因素、家庭因素指标,全国各地考生可在任何地方报考,而招生学校将视学生的学籍所在地,给予教育薄弱地区学生一定的加分评价,甚至会面向薄弱地区单列一定的招生数。针对这种情况,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城市求学,可以城市学籍参加统一测试,申请大学自主招生,但他们能否被录取,取决于自身的综合素质,相比家乡学生,在新的录取体系中,不一定就有优势。

从某种程度说,异地高考问题和当前自主招生联考问题,其实是一回事。如果教育部门放权,推进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异地高考问题得到解决,而联考也就不会出现目前的变为了。

不听取民意,只有政府部门拍脑袋决策,这必然带来三方面问题:一是政策制订极为随意,我国联考政策一年一个样,就是因这一决策机制所致,如果有必须听取民意,将民意纳入决策的机制,政策不可能变

化这么快。二是政策只体现行政部门的意图,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意见被漠视,很多政策一出台就遭遇质疑。三是无法表达意见的教育者、受教育者群体陷入彼此“掐架”中。一项政策,总归会有得利者,也有不利者,于是得利的一方,和不利的一方,就打起口水战。而在热闹的口水战中,大家似乎忘了,这次的得利者,下次可能是受损者,造成受损的原因,不在于这次的得利者,而是作为决策者,处于强势的行政部门。

要让每个人的权利都得到切实的维护,就必须赋予他们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当每个公民都有了这样的权利,才会减少不公的事情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发生。每个人也应该尊重他人的这些权利,不要对他人遭遇的不公幸灾乐祸,要知道,决策机制不变,类似的不公转眼就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七成大学生何以自称“中下层”

■吴江

日前,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的一份报告中,对12所高校超过两千名学生进行调查。数据显示,“80后”、“90后”大学生普遍对就业信心不足,自身满意度不高,更加注重“个人”色彩,同时超过半数表示对政治事务感兴趣且有能力参与公共事务决策。大学生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价也在降低,约有七成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在当地属于“下层”和“中下层”。

正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本该是“天之骄子”,却多达七成自认为“中下层”,两相对照,的确多少令人唏嘘。大学生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恐怕一点也不比“丰满”与“骨感”的距离来得更近。

不过,虽然七成大学生自称“中下层”,与“天之骄子”的一贯形象对照,多少有自降身价之嫌。但既然是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价,大学生的这一自我认知却未尝不是出于客观理性的判断。事实上,对于大学生而言,无论家庭出身如何,仍然在求学阶段的他们,很多连经济上的自立都尚未实现,财富的积累当然更无从谈起;至于社会地位,很大程度上也来自

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对社会的贡献,忙于学业,处于蓄势待发阶段的大学生群体,当然不能仅凭成绩和分数便建立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相比自称“天之骄子”的盲目乐观与自大,大学生能够认识到自身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下层”,恰恰体现了一种自知之明。而大学生有了对自身更为客观真实的认知,或许也才更有利于对自身进行合理定位并规划未来的发展。

如果“中下层”的归属感仅是对自身当下社会经济地位的理性认知,当然不必过分忧虑。然而,七成大学生自称“中下层”,恐怕不仅仅止于对当下境遇的理性判断,而更多流露出对改变未来社会经济地位缺乏自信。无论是对就业的信心不足,还是对自身满意度不高,自称“中下层”的背后,与其说是对个人定位的客观理性,毋宁说或多或少暴露了大学生群体的自卑感。而这恐怕才最值得关心。

平心而论,缺乏自信与自卑感,一定程度上其实与大学生竞争力的相对下降有关,毕竟,虽然经济不够景气,就业市场也不容乐观,

但假如大学生真的具备实力,是金子其实总会发光,非但不必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作无谓的担忧,反而更应对未来社会地位的提升充满自信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七成大学生自称“中下层”,最该是“潜力股”的大学生们,何以反对未来如此缺乏自信,充满悲观和忧虑,恐怕也更需反思。

不可否认,大学教育质量下降、大学生竞争力不足固然是造成上述心理的重要因素。但这恐怕还不是事实的全部,更不能全归咎于大学生自身的因素。现实中,收费不菲的大学教育,却并未提升大学生的竞争力,甚至连起码的自信心都付之阙如。尽管对大学不能冀望过高,但面对大学生的普遍悲观,大学教育恐怕更应感到惭愧。此外,七成大学生自称“中下层”,恐怕同样与当前社会阶层的固化趋向有关。现实中,无论是“拼爹”现象的泛化,还是诸多行业所客观存在的壁垒,个人发展机会与空间所受到的压抑与限制,又何尝不是大学生“中下层”的重要因素呢?

一言以蔽之,七成大学生自称“中下层”,的确更需多方反思。(作者系评论撰稿人)

把大学放入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放入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来考察其性质,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大学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大学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时代诉求的结果”这一命题,从而更深刻认识到大学的责任与使命,深化对“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好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的认识。

融入社会、服务社会是大学存在与发展的本质要求。大学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存在的根据就在于它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担负着重要的职责。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教育方针,它从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深刻揭示了我国教育工作的使命和责任;也正因为这种关系,决定了我们的教育事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中具有越来越突出的地位和作用。认清大学的社会属性,勇担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责任和使命,是大学办学和发展的首要前提。我们在强调大学自主办学的同时,应清醒认识到大学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存在的责任和使命。脱离社会责任与使命来研究探讨大学的科学发展,无疑是本末之术、无源之水。高校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明确办学理念,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统筹好大学的社会属性和学术属性的关系,在张扬学校学术属性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大学的社会属性,在两者的深度融合中做好高校各项工作。

在深度融合中探索特色发展之道

特色发展是高校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是解决“怎样办好大学”的重要途径。自现代大学出现以来,高校就一直在追求各自的特色,以自身的优点和特色来取得持续长远的发展,赢得社会的认可和支持。办学特色是学校在长期办学实践中积淀形成的,对一所大学的办学具有广泛的影响,具有稳定性、发展性,是学校个性的集中体现,特色发展就是要不断固化和彰显学校的办学特色,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使之成为支撑学校事业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办学特色是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协调优化中形成的。

概言之,办学特色的凝练、学校特色发展道路的形成,都是在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的。比如,“三农”服务,无疑是农业院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作为地方农业院校,其特色主要体现在地方性、行业性。各地农业产业的基本特征虽说大同小异,但各地的资源禀赋、地理条件、人文环境等有不小差异,这也导致地方农业院校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的优势、不同的重点、不同的特色。因此,培育学校特色,坚持特色发展,就不仅要考虑学校的自身积淀,同时要更加注重本区域农业产业的特征,把握好学校与产业的结合点,更好地融入现代农业的发展。

在深度融合中提高育人质量

教育人、培养人、发展人是大学与生俱来的责任和使命,是实现大学社会责任的主要体现。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跨入“大众教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更好地实现大学的育人目标,更加突出地摆在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面前。“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方案,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是高校应该不断探索和回答的问题。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就是要从更深的层面去思考和解决我们应该让大学生在学校期间学什么、怎么学,怎么做到学以致用、学有所获,怎样使他们通过学习获得适应社会需要的专业技能和较强的学习、生活能力。从教育者的角度来说,就是依据国家的教育方针、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教育者应该教会学生什么、让他们掌握什么。这里面最为关键的环节是课程体系设置和课程内容更符合,接近经济社会的实际需要。因此,深化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改革,一个重大的命题就是要使大学课程体系的设置和课程内容能更好地与各产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相对接,就是要让教育教学的内容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深度融合,用经济发展的实践成果及时丰富教学内容,用产业发展的新要求及时调整课程体系设置,使我们培养的人才能更好地适应各行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在深度融合中提升学校精神

大学精神是大学优良传统中最宝贵的部分,反映了一所学校独有的价值取向和品格,是大学历久弥新的发展动力。大学精神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它是学校在承担社会责任、引领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理念、品格和文化,脱离社会责任来研究大学精神只能让大学背离其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培养大学文化、凝练大学精神首先要注重大学责任意识的培养和提升,这是大学文化、精神的核心要素。而责任意识的培养和提升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深化大学与社会的关系的过程。

同时,大学文化、大学精神是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实践中形成和传播的,离开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仍在于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就缺失了必要的载体和条件。可见,立足大学的责任与使命,坚持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是提升学校精神、汇聚大学发展动力的关键所在。(作者系安徽农业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

朱立军

在深度融合中彰显大学责任使命